

書寫中國翻譯史

第十一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

Writing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Eleventh Young Researchers' Confer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主辦

Organiser: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協辦

Co-organiser: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年 12 月 12–13 日

12-13 December 2024



香港中文大學 · 翻譯研究中心 · 湖南科技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rct.cuhk.edu.hk/> · <https://wyxy.hnust.edu.cn/fysyj/jj1/index.htm>

從「syphilis」漢譯迭變管窺中醫知識現代化的演進

曹雙飛 西南大學

摘要：清末以降，不少西方術語以「譯創」式知識生產的方式加入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構建中。本文基於中醫典籍、醫學辭典及西醫譯著等文獻資源，通過版本考訂、譯本對比等方法對醫學術語「syphilis」譯創史進行補註，從知識翻譯的關係敘事視角出發對圍繞該詞的諸多譯名進行剖析，探討西醫知識翻譯推動中醫知識現代化演進的多元複雜因素，彰顯知識翻譯在中國現代性知識形成中發揮的重要話語功用。研究發現：從本土知識準備期的「花柳症」到外來知識導入期的「疔毒」，再到新舊知識過渡期的「瘰」，最後被翻譯概念形成期的「梅毒」所取代為止，醫學術語「syphilis」的譯創史可以說是西醫知識翻譯推動中醫知識現代化演進的縮影。儘管其呈現出的只是語言符號之間的線性互譯，但實質上則是網狀式多元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其不僅是作為地方性知識的西方醫學與中國傳統醫學接榫傳衍的產物，同時也是各方知識主體博弈、更迭與最終競合的結果；另一方面，其不僅得益于外來譯者與本土譯者的合力，而且也受到了醫學知識內核不斷厘革的推動。

關鍵詞：syphilis；譯創；中醫知識；現代化；多元複雜性

關於魯迅的「直譯」

陳曉淇 關西大學

摘要：通過對魯迅翻譯的底本和方法的考察發現，魯迅的「直譯」觀念不僅包含逐字翻譯，還涵蓋了靈活處理的意譯。魯迅的「直譯」兼具「信」與「誠」兩種不同的標準，在不同題材中有著不同的翻譯方法。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文藝理論譯作中，魯迅的「硬譯」強調對底本高度忠實，藉由日語資源對漢語進行改造。然而，在處理童話等文學作品時，魯迅則強調譯文的流暢性，允許一定的自由度。此外，通過對魯迅「誠」的翻譯觀形成過程的詳細考證，可以看出魯迅的具體翻譯方法和標準受到了日本翻譯界的顯著影響，顯示了中日兩國在翻譯標準層面的深層次互動。

關鍵詞：森田思軒、原抱一庵、二葉亭四迷、《說鈿》、《域外小說集》

萬勿刻遲：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北京的危機翻譯（1811-1845）

鄧科 西南科技大學

摘要：作為中英外交關係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及譯者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前後扮演的角色在史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先行研究普遍聚焦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衝突區域，尤其關注在中英外交、商業和軍事事務中，廣州和澳門的譯者所扮演的角色、面臨的風險，以及其翻譯忠誠問題，揭示了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中英之間富有動態性且激烈沖突的翻譯景觀。然而，北京的清廷中央機構對此有何反應？在應對語言障礙和情報翻譯危機之時有哪些制度性解決方案？在這些問題尚未得到回答，對於全面理解清朝當時應對西方外交及軍事策略不可謂一大缺憾。

本文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尚未公開的宮廷檔案為基礎史料，借助歷史描述法，首先從宏觀史和中觀史的角度考察清政府的語言-翻譯體制及其機構翻譯制度，並在此基礎上，重構清內閣西洋情報翻譯人員的微觀歷史，藉此分析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北京在對英翻譯問題上的策略、政策和決策過程。研究發現，清廷以地緣政治為考量，長期推行一種以內陸治理為中心的語言-翻譯體制，使海外語言（如英語）及其翻譯規劃處於極度邊緣化的地位。另一方面，為處理應急溝通問題，清廷長期以拉丁語作為仲介，依賴駐京西洋傳教士和廣東通事及行商這兩大群體的協作，來處理對英外交和情報翻譯事務。然而，由於禁教問題以及西洋人譯員在情報翻譯方面潛在的安全風險，清廷於1811年至1829年間從「廣東洋行貿易漢人」內招募了陳耀光、謝覲廷和袁德輝三位民人赴京，以促成內閣西洋翻譯事務的去西洋人化。但三位機構譯員的翻譯經歷證明，北京雖試圖通過全面掌控西洋語言的翻譯，進而實現情報獨立，但最終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本文不僅揭示了這一關鍵時期中西關係的複雜性，也為理解帝國治理與翻譯之間的動態關係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本文認為，國家翻譯能力的建構以及行政翻譯規劃，有必要超越國家安全的現時需求，綜合考量國家對各種本土語言及外語的潛在需求，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關鍵詞：第一次鴉片戰爭；危機翻譯；機構翻譯；西洋語言；情報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cuhk.edu.hk/rct>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危機時刻的精神試煉

瓦雷里《精神的危機》一文的中日譯介旅行，1920-1940

黃詩琦 京都大學

摘要：本文探討了法國詩人瓦雷里《精神的危機》一文在 1920-1940 年代中國與日本知識界的譯介之旅。《精神的危機》一文是瓦雷里對一戰後興起的歐洲文明危機論的回應，儘管文章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色彩，但在東亞卻引發了不小的反響。在中國，吳宓通過英譯本轉譯，呈現出帶有美國二十年代文化背景的解讀；而在日本，自 1930 年代以來已有三種不同的日文譯本問世。本文分四個部分探討此譯介之旅，重點關注核心概念「esprit」在中日間的不同翻譯及其在各自思想界的接受與轉化。在日本，戰時的言論管制與「日本精神論」等思潮的流行，形塑了瓦雷里思想接受的土壤；在中國，隨著戰後局勢的變化，瓦雷里的思想亦零星被接受。通過考察兩國的譯介特徵與時代背景，本文試圖勾勒出一個新的東亞思想場，揭示跨文化譯介中的複雜性。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cuhk.edu.hk/rct>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吳宓與《學衡》翻譯的歷史

姜筠 武漢大學

摘要：《學衡》翻譯的現有研究中，策略分析與思想闡釋頗為豐富，可是應當注意到，《學衡》翻譯以期刊為載體，它與獨立書籍翻譯不同，研究視角與方法當有區別。《學衡》辦刊史長達十年（1922-1933），西學翻譯貫穿始終，作品種類豐富，所涉譯者眾多；那麼，翻譯對象如何選定，譯者來自何處、又於何時、因何參與翻譯，譯作如何編排入刊，此類問題仍不明朗。若不採用動態眼光觀察其翻譯活動，則難以把握《學衡》翻譯的歷史面貌，這也是現有研究的不足。鑒於吳宓為實際主編，本文根據其生活軌跡將《學衡》翻譯劃分為四個時期：東南大學時期（1922.1-1924.7）、東北大學時期（1924.8-1925.2）、清華辦刊前期（1925.2-1926.12）、清華辦刊後期（1927.1-1933.9）。通過閱讀吳宓日記與書信等史料，結合《學衡》譯作刊登情況，描繪其翻譯如何隨主編工作地點變動而在不同時期各具特點，探查影響翻譯生產的物質文化條件，如各校的辦學資源、吳宓擔任的社會職務等；研究中尤其關注吳宓的交遊，以揭示其社會關係網對《學衡》翻譯的直接作用，這主要體現在翻譯對象的選擇、具體翻譯計劃的推進，以及譯作的最終樣態。此外，本研究希望為其他期刊翻譯研究提供參考，在相對靜態的譯作分析之外，納入對整體翻譯活動的描述與解讀，從而深入理解期刊翻譯的特性。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cuhk.edu.hk/rct>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植入「新美術」——魯迅譯介板垣鷹穗《近代美術史潮論》與 1930 年代中日新興藝術聯動

廖柳棉 上海交通大學

摘要：魯迅自 1927 年翻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後再無板垣鷹穗作品的譯介，但深入考察魯迅的閱讀史可發現，魯迅對板垣鷹穗的思想接受不止於此。《近代美術史潮論》之所以被魯迅評價為「新的實驗」，要因在於該書以新康得派歷史哲學為基調的藝術史觀。並且革命文學論爭時的魯迅對新文藝的構想，與板垣鷹穗在該書中提出以「民族色彩」和「時代精神」為核心的藝術主張有著顯性互文與共通之處。此外，1930 年魯迅譯介的《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原載板垣鷹穗主編雜誌《新興藝術》，該文的選編及譯介過程，反映了中日左翼電影運動之間的「時差」與「共振」。可見魯迅譯介板垣鷹穗的跨語際實踐，揭示了一道 1930 年代初期中日新興藝術思潮聯動的暗線。

關鍵詞：《近代美術史潮論》 板垣鷹穗 新興藝術 左翼電影 魯迅

「小婦人」的多重譯影：一九三〇年代鄭譯《小婦人》漢譯及其接受

彭瑩 北京大學

摘要：1932 年教育界聞人鄭曉滄自刊出版 *Little Women* 中譯本，隨即在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和文學界引發熱議，其後隨著 *Little Women* 電影在華的熱映，一時之間國內掀起「小婦人」的熱潮，然而目前鮮有研究關注這場「翻譯事件」。本文試勾畫一九三〇年代 *Little Women* 的跨文化之旅，在搜集鄭譯《小婦人》文本材料與副文本材料的基礎上，結合社會文化語境，梳理 *Little Women* 的翻譯、傳播和接受脈絡。研究發現，相較一九二〇年代廣學會譯本——《四姊妹》（1925 年）《賢妻良母》（1927 年）——以規訓女學生和女教徒為導向，鄭曉滄選中《小婦人》是其作為教育家對 *Little Women* 在英語世界廣受認可的教育功用的敏銳捕捉，將其視為一般的、普遍的、去性別化的青少年讀本。但是漢譯本在推介過程中，又被附著以「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女性規範教育」等新質素，強調青年為入之道、家庭經營之道、女性規範之道。在接受過程中，西洋「小婦人」又被不同性別立場的讀者冠以「賢妻良母」的典範、新婦女的「烏托邦」幻象、反摩登女郎的旗手等多重身份，參與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性別話語的建構。

關鍵詞：《小婦人》漢譯；民國翻譯史；翻譯接受；翻譯與性別

文選如何編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外譯選集的創生

曲楠 北京理工大學

摘要：1930 年代前期，在魯迅等人的策動下，中國現代文學外譯選集得以創生。以 *Straw Sandal*、*Living China* 等選集為代表，魯迅與史沫特萊、伊羅生、斯諾等合作策劃、推動的外譯行動，不僅在國際層面上，拓展並回應著現代文學「經典化」的思路，更隱含著革命文學自身突圍和推介的隱衷，以及左翼文藝國際聯動的生產策略。作為「左翼國際」文藝戰線的有機組成部分，抗戰爆發後的中國左翼文藝在接受「國際文學」機制影響、規約的同時，也需要凸顯自身獨特的革命文化主體，策略性地參與到全球文化抵抗的實際行動中。因此，中國左翼文藝界在譯入「國際文學」的同時，也需要更為主動地向國際譯出本土的左翼革命文藝，通過國際市場的流播，塑造本土革命的文化形象，爭取「左翼國際」的輿論資本和實際援助。鑒於外譯本土文學的需要，「選集」作為一種典型的出版形式，無疑彰顯出集中、高效的特質。實際上，在現代中國長期譯介海外文藝的歷程中，「文學選集」都是譯者綜合把握、擇取目標文本的重要資源，比如茅盾在為《譯文》雜誌挑選譯介物件時，便參考了世界文學「英譯選集」*Famous Stor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實際上，「文學選集」生成的背後，蘊含著鮮明的政治指向性，作家、作品的選擇，乃至「選集」的編排、譯介、裝幀和出版，其操作標準均取決於編譯者的立場和目的。這些選集如何在經典文本與左翼面貌之間微妙布局，又如何漫長地影響著中國左翼作家跨國推介的形式和版圖，而出版形式本身的政治性，又在何種程度上得以轉化為革命行動的策略，如上種種問題都希冀在本研究中得以討論和縷析。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cuhk.edu.hk/rct>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翻譯「大英」帝國：《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的「女皇 (Queen)」新譯

王澤偉 香港浸會大學

摘要：劉禾曾指出，近代中西衝突過程中的翻譯，尤其是涉及主權的詞彙，充斥著各種話語鬥爭、語言暴力，而非簡單的語義爭端。《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是一部出版於 1846 年英佔區舟山的甬方言、泰盧固語與英語合編的語言教材，由時任首席會計仙尼華四 (P. Streenevassa Pillay) 編寫。按其英文序言，該教材乃為印度人學習甬方言、甬人學習英語以便在英國機構任職為目的進行編纂的。故而，該教材因編者之身份、逃脫清政府語言審查的特殊出版地、迎合軍政府語言調查政策等因素，致使內文與副文本中出現諸多抬升英國地位的細節，如在「啖咭喇」盛行的年代，已將「大英」與「大清」並列；將「Queen」超時代翻譯成「女皇」（同時代多稱「(大) 皇后」或「女主」）。要至其後三、四十年，「女皇」才開始普遍進入「英華字典」。這不僅於翻譯史中具有相當的開創性，還具有相當的文化研究價值——「女皇」之譯，展現了該詞彙的超時代性、中文僭越性與英國的本位主義。而且，該個案的探討，又可與王宏志、關詩珮與莊欽永有關大英帝國的翻譯事件、知識建構與「皇/王」的翻譯之爭等成果產生對話——《雜字文》的「女皇」新譯可納為大英帝國有關的主權翻譯、知識建構、西方國名冠以「大」與君主的「皇帝化」議題的近代化起點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cuhk.edu.hk/rct>

湖南科技大學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京師同文館公法譯本的生產及對晚清外交的現實影響 ——以《公法便覽》為中心

徐婷 曲阜師範大學

摘要：京師同文館譯印了《公法便覽》等多種國際法著作，建構了「萬國公法」譯著系統。國際法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生產的西方知識，學科的發生、發展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實踐密切相關，國際法學家的表述一般服務於特定國家或區域的利益，在同文館譯本出現的時期，該學科的知識仍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同文館公法譯本的源語文本對國際法原則的闡釋，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而該館公法翻譯的主導者丁韞良以美國立場為基準，傾向於凸顯美國國際法學家專著的權威性。「館譯」公法將國際法的術語體系及知識結構相對完整地移植到中國，而同文館以《公法便覽》為教材開設的「萬國公法」課程，又增進了晚清外交儲備人才對國際法知識的理解與認同。「館譯」公法內容被運用到與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相關的國際交涉之中，對晚清外交產生了深刻影響。本文擬結合《公法便覽》等同文館公法譯著及其源語文本、晚清外交檔案等文獻，考查西方國際法知識在 19 世紀中後期的動態演進、同文館公法譯本的生產及相關譯本在東北亞地區的傳播，進而研究晚清知識階層對國際法知識的接受及批判，勘察「館譯」公法在晚清外交活動中的現實應用價值。

關鍵詞：京師同文館；「館譯」公法；《公法便覽》；晚清外交；知識體系近代轉型

生物學在近代中國的「知識化」： 潘光旦對亨廷頓的三次譯介（1926-1936）

閔彩萍 廈門大學

摘要：潘光旦被認為是近代中國首位人文生物學家。所謂「人文生物學」，即是以生物學的立場，重新觀察與解讀傳統文化。這一做法，是嚴復首譯進化以來，本土知識份子借外來學說反思人文傳統的一個延續，在近代思想史中尤其具研究意義。不過，現有研究對潘光旦的英文著述，尤其是翻譯作品的利用明顯不足，這導致其人文生物學思想的成型過程失之模糊，也較難完整認識近代中西知識交匯的歷史脈絡。本文利用潘氏在美留學期間鮮為討論的英文文論、書評、翻譯作品，勾勒其人文生物學思想成型前後的知識譜系。研究發現：潘氏人文生物學思想是在翻譯中成型的，美國學者亨廷頓的種族學說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人文生物學論從》成書兩年前，1926年，潘光旦便以亨廷頓 *The Character of Races* 一書中從生物學出發的種族論述作為論據，駁斥梁啟超代表的人文地理觀；歸國執教後，他又選擇書中涉及中國的四章，合譯為專書《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此次翻譯實踐促成其人文生物學思想正式成型；1936年，應對緊迫時局，潘光旦再度譯出 *The Character of Races* 一書中第九章《猶太民族與選擇》，以猶太民族之可塑性品質，勉勵國民振奮于局勢。透過潘光旦在1920至1930年代對亨廷頓的三次譯介，可以近觀中國社會學發展早期知識份子的一個認知譜系，從而重新理解西方進化學說如何深遠影響近代中國思想界。

關鍵詞：潘光旦；人文生物學；亨廷頓；種族；翻譯

Translator's Visibility in Catholic Print: The Case of *Dao Yuan Jing Cui*

Xiaojing ZENG
University of Galwa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ranslator's visibility is embodied in Catholic print in Late-Qing China (1842-1911). The case under study here is *Dao Yuan Jing Cui* (道原精萃), a book collection produced in Tushanwan Press (土山灣印書館) and sent to the Vatican in 1887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ordination of Pope Leo XIII (1810-1903). Comprising seven titles of books presented in eight volumes, it is attributed to a multiple translatorship made up by Guilio Aleni (艾儒略, 1582-1649), Alfonso Vagnone (高一志, 1566-1640), and Li Di (李欵, 1840-1911). Placing Li Di as the central figure in question,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notion of visibility as a key to Catholic print and translation landscape in Late Qing. It surveys how he maintained his visibility, with comparison to the other two missionary translators who lived in a different era. It is found that Li Di was visible as the translator not only by establishing constant presence in pertinent paratexts, but also by leaving distinct marks inside the translated texts. Such visibility he enjoyed reveal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book production adopt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Late Qing and opens up a pathway to rediscover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print culture during this epoch.

Key Words

Translator's Visibility; Catholic Print; Late Qing; Li Di; *Dao Yuan Jing Cui*